

从“天城”到“杭城”

——14-20 世纪中叶欧洲对杭州的认知历程

邬银兰

【摘要】：意大利中世纪旅行家马可·波罗不仅到过杭州，而且首次向欧洲人介绍了被他称为 Quinsai 的杭州城，并称之为“天城”。从 14 世纪开始，为了找到这个“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欧洲人一直试图确定 Quinsai 的位置，并形成了多种说法。哥伦布 1492 年首航美洲时，认为 Quinsai 位于他所到达的古巴附近。1521 年，西班牙殖民者攻陷阿兹特克帝国(Aztec Empire)首都后，欧洲学者甚至提出了墨西哥城就是 Quinsai 的说法。16 世纪，直接来到中国活动的欧洲人，则将 Quinsai 推定为中国的一些城市，包括北京、南京、苏州和杭州等。14—17 世纪的欧洲制图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把 Quinsai 标绘在东亚大陆不同的位置上。17 世纪中期，在杭州生活过多年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地理学家卫匡国，第一次明确地将 Quinsai 考定为杭州城，但错误地认为此词是汉语“京师”的音译。20 世纪前半期，经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最终得出了 Quinsai 源自汉语“行在”一词的可靠结论。在长达 6 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杭州”成为欧洲学术研究中一个持续讨论的热点，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马可·波罗 行在 哥伦布 卫匡国 藤田丰八

杭州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意大利中世纪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 年)将杭州率先介绍到欧洲后，杭州成为欧洲人所向往的“天城”。从 14 世纪开始，欧洲人一直试图确定这个“天城”的位置，并逐渐形成了多种说法。欧洲人发现美洲后，有人甚至将“天城”考定为南美洲的墨西哥城。17 世纪中期，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 年)通过中西文献比较及实地考察，有力地论证了“天城”就是杭州。20 世纪前半期，中外学者终于澄清，马可·波罗称呼杭州的西文写法 Quinsai 源自汉语“行在”。因此，欧洲人对杭州的认知过程，也是近代欧洲人中国观形成的一个重要缩影。也因为 14 世纪以来，欧洲人对“天城”不懈的探索和寻找，客观上使得对“杭州”的研究成为了欧洲学术界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热点问题，从而扩大了杭州在世界上的影响。近年来，孔陈焱¹、龚纓晏²、黄时鉴³、周东华⁴等学者都曾探讨本文所涉及的内容，但由于条件的限制，这些研究在西文原始史料的利用方面，还不够系统绵密。为此，本文通过梳理西文文献，对相关问题做一更深入的考察。

一、想象中的“天城”

1275 年，马可·波罗沿陆上丝绸之路进入元朝统治下的中国，1291 年从泉州启程，经海上丝绸之路西返，并于 1295 年回到意大利。1296 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亚那之间的战争，结果被热亚那人俘获。在狱中，他向一位名叫鲁思梯切洛(Rustichello da Pisa, 约 1272—1300 年)的作家讲述自己在东方的所见所闻。鲁思梯切洛把马可·波罗的口述内容用意大利北部流行的法语—威尼斯混合语(Franco-Venetian)记载下来，整理成书，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先后到过大都(北京)、扬州、杭州等地。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中国北方地区被称为“契丹”(Cataio, Cathay 等)，因为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曾经统治过这片广大的区域；契丹的都城被称为“汗八里”(Chambaluc)，这是蒙古人对元大都的称呼；中国南方地区被称为 Mangi(又作 Manzi 等)，这是汉语“蛮子”的音译，原是中国北方地区对南宋民众的蔑称；杭州则被称为 Quinsai(又作 Quinsay, Kinsay 等)，这是汉语“行在”的音译，因为 1138 年南宋定都杭州后，将杭州称

为“行在所”或“行在”，⁽⁶⁾意为皇帝临时暂住的地方，以表示收复北方故土的决心。马可·波罗还根据“天上天堂，地下苏杭”之类的汉文谚语，⁽⁶⁾把杭州称作“天城”(celli ciuitas)。⁽⁷⁾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杭州的记叙约占全书的十五分之一，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还是整部游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章节”。⁽⁸⁾他介绍说：“蛮子地域共有富庶大城一千二百余所”，其都城就是行在城，这也是“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此城完全建筑于水上，四周有水环之”，城市周长100哩，共有12座主要城门；城门之外8哩，还有许多城市；行在城内有1万2千座高大的石桥，还有一个美丽的大湖，“沿湖有极美之宫殿，同壮丽之邸舍”；城中原来蛮子国的王宫“是为世界最大之宫”。⁽⁹⁾

元朝于1368年灭亡后，新兴的明朝通过朝贡关系努力限制对外交往，中外文化交流因此而严重倒退。中亚及西亚地区，长期的战乱阻断了中国与欧洲的直接交往。在欧洲，14世纪中期爆发的黑死病，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以及其他大小战争，也使社会陷于动荡之中，从而失去了对外交往的动力。⁽¹⁰⁾在此背景下，欧洲人只能在头脑中想象中国，“而《马可·波罗游记》则为他们的想象提供了最重要的权威信息。”⁽¹¹⁾研究表明，1530年之前形成的《马可·波罗游记》抄本共有135种，包括10多种文字。⁽¹²⁾这些抄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可·波罗游记》广泛的影响力。

不过，《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主要被当作供人消遣的文学作品，很少有人将其视为地理著作。马可·波罗本人并没有画过地图，《马可·波罗游记》的众多抄写者也没有根据这部游记绘制过地图。⁽¹³⁾据说14世纪中期绘制在威尼斯总督府地图大厅(Sala delle Due Mappe, Palazzo Ducale)墙壁上的地图，曾经吸收了《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内容，但由于该地图在1483年被火焚毁，所以这个说法也就无法得到证实。⁽¹⁴⁾目前所知，“在现存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中，最早利用马可·波罗所提供的信息来表现东亚地区的，就是《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The Catalan Atlas of 1375)”。⁽¹⁵⁾此地图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被视为法国的国宝。在这幅地图上，画出了汗八里(Chanbalech)，刺桐城(Ciutat de Zayton)，行在城(Ciutat de Cansay)等。⁽¹⁶⁾其中行在城被画成一个圆形的欧洲式城堡，城堡上方还树着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上画满了纵横交叉的罗经线，但没有经纬线。虽然行在城被错误地置于南海北岸一个半圆形海湾旁边，而不是东海西侧，不过却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位于大体相同的一条直线上，相当于北纬30度左右。这样，地图上行在城距离赤道的位置，与实际位置相去不大，因为杭州市中心的纬度是北纬30°16′。

1450年左右，有人以《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为基础，绘制了另一幅地图，由于收藏在意大利摩德纳(Modena)的埃斯特图书馆(Biblioteca Estense)中，所以被人称为《埃斯特世界地图》(Mappamondo Estense)。此地图中国部分的资料，主要来自《马可·波罗游记》。但与《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相比，显得比较粗糙，⁽¹⁷⁾一些地名的写法出现了讹误，例如Cambalec(汗八里)被写成Garibalu，Cansay(行在)被写成了Cansu。不过，地图上杭州(Cansu)的位置，则与《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相同，都出现在南海北侧的海岸线上。值得一提的是，在15世纪中期绘制的《利尔多世界地图》(The Leardo map of the world)上，行在(Cansai)也被画在这个位置上。⁽¹⁸⁾

1458年前后绘制的《毛罗地图》(Fra Mauro's Mappamundi)被人称为“最后一幅中世纪地图”，⁽¹⁹⁾同时也是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最多的一幅地图。⁽²⁰⁾地图上的注文写道：“蛮子省(provincia de mango)据说有1200座城市”。此地图将行在写作Chansay，并且画有一座宏大的欧洲式城堡建筑，就位于“赛里斯海”(Oceanus Sericus)之滨。“赛里斯”是古代希腊罗马时代对中国的称呼。⁽²¹⁾就中国部分而言，在《毛罗地图》上，行在城出现在宝应(Paugin)、通州海门(Cinzu)⁽²²⁾的南面，与实际位置相符。但通观整幅地图，可以知道，行在的位置实际上被错误地北移了，与黑海北端、荷兰、爱尔兰北部位于同一条直线上，大体上相当于北纬50度左右。

在《毛罗地图》上，行在城不仅画得非常醒目，而且还有这样的注文：“华贵的建筑”，“在这座华贵宏伟的城市中，生活之雅致，习俗之优良，简直难以尽述。”特别是，地图左侧还有这样一条长长的注文：“这座华贵的城市叫做行在，位于一个大湖中间，就像威尼斯一样；城市周长100哩，人口众多，郊区广大，共有12座主要城门。离开此城8哩，有许多比威尼斯还

要大的城市。行在城内有 12000 座桥梁, 14000 个壁炉(stue)。行在城中间, 是一个周长 30 哩的大湖, 湖中宏大的宫殿中, 常常举行盛宴。城中的人口, 共有 90 个秃满(tuno), 每个秃满由 1 万户(原文是“烟火”, fuogo)组成, 这样, 共有 90 万户。1 户, 又称 1 屋(casa), 由 12 个家庭(fameie)组成。人们在这里钻研每一门学问, 各行各业兴盛而有秩, 还有许多华丽动人的事情。”显然, 这段注文来自《马可·波罗游记》, 但不知什么原因, 把户口的数字写错了, 因为《马可·波罗游记》原文说: 行在城共有 160 个秃满, 1 个秃满等于 1 万户, 因此总共有 160 万户。⁽²³⁾

在欧洲地图学史上, 上面所介绍的几幅地图(从《1375 年加泰罗尼亚地图》到《毛罗地图》), 都属于中世纪的“世界舆地图”(mappaemundi)。这些地图都不是根据投影方法绘制的, 因而也没有经纬度。所以, 在不同的地图上, 行在的位置各不相同。其实, 早在古希腊时期, 托勒密(Ptolemy, 约 90—168 年)在其《地理学》(Geography)中就已经提出了地图投影方法, 现代学者将此方法誉为“古代人最卓越的创造”。⁽²⁴⁾西罗马帝国于 476 年灭亡后, 托勒密的《地理学》在西欧失传, 仅在拜占廷帝国被人传抄。14 世纪末, 托勒密《地理学》希腊文抄本从拜占廷传回西欧, 并于 1406 年首次被翻译成拉丁文, 从 15 世纪 70 年代开始, 又被大量印刷出版。⁽²⁵⁾这样, 制图学家们就根据托勒密投影法, 通过计算每个地点的经纬度数字来绘制地图。而《马可·波罗游记》却是采用按时计程法, 即用骑马行走所需要的时间来表示两地之间的距离, 例如, “从长安(Ciangan)出发, 骑马行走一天, 到达行在”。⁽²⁶⁾因此, 制图学家在绘制地图时, 首先必须将这种模糊的按时计程法转化为具体的经纬度数据。15 世纪末, 一些制图学家开始探讨行在的经纬度, 并且将其标绘在地图上。其中, 比较重要的是马泰卢斯(Henricus Martellus, 1440—1496 年)。

现存的马泰卢斯世界地图, 共有三种。第一种是手绘地图, 附在他的著作《海岛志》(Insularium Illustatum)抄本中。此抄本在佛罗伦萨、伦敦等地都有收藏。第二种是罗赛里(Francesco Rosselli, 1445—1513 年)刊印出版的小型地图(37.5×52.3 厘米)。⁽²⁶⁾第三种就是美国耶鲁大学收藏的大型挂图(201×122 厘米)。⁽²⁷⁾这三种地图, 都绘制于 1490 年前后, 而且都采用了托勒密的投影方法, 基本形状相同, 只不过前两种地图可能由于太小, 没有标出经纬度, 而耶鲁大学收藏的地图上则有经纬度, 本初子午线是欧洲大陆西侧的福岛(加拉利群岛)。在耶鲁藏图上, 行在(Quinsay)位于北纬 42 度左右, 距离福岛约 230 度。而实际上, 杭州距离福岛的距离仅约 135 度。所以, 这幅地图关于行在的经度及纬度都是错误的。

在马泰卢斯绘制的上述三种世界地图上, 都用一组欧洲式的宏大建筑来表示行在城, 城中还画有一个湖泊。在罗赛里的刊本上, 关于行在的注文比较简单: “此城周长 100 哩, 共有 1 万 2 千座桥梁。”在耶鲁藏图上, 有一段较长的注文: “这个行在城, 据说周长 100 哩, 有 160 个火(ignes)”。后面的注文已经磨损不清, 只能依稀看到 10000 这个数字。⁽²⁸⁾对照《马可·波罗游记》, 文中的拉丁文“ignes”(复数, “烟火”), 单数形式为 ignis, 与意大利语 fuoco (“烟火”)同义, 等于 1 户。拉木学(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1485—1557 年)意大利文版《马可·波罗游记》也说, 秃满”(toman)指 1 万户, “火”(fuoco)和“家庭”(famiglia)同义, 指 1 户。⁽²⁹⁾

1492 年, 贝海姆(Martin Behaim, 1459—1507 年)制成一只直径为 50.7 厘米的地球仪。此地球仪至今保存在纽伦堡的博物馆中, 上面共有 1100 多个地名, 包括契丹(Cathai), 汗八里(Kambalu), 蛮子(Mangi), 行在(Quinsai)等。地球仪上行在的经度与马泰卢斯地图上的基本相同, 距离福岛约 230 度, 但纬度只有 25 度左右, 正好在北回归线(23° 26′)的上方。此外, 由于对中国实际地理一无所知, 所以, 贝海姆错误地把行在置于刺桐(Zaytun, 现在的泉州)西侧的一个海湾旁边。⁽³⁰⁾

从古希腊开始, 欧洲人将地球分为 360 度。马泰卢斯等人认为, 从福岛向东到亚洲最东端的行在共有 230 度, 这就意味着, 从福岛向西到行在只有 130 度(实际上是 225 度左右)。也就是说, 从福岛向西由海路到达亚洲东部的距离, 要大大小于从西欧向东经陆路到达亚洲东部的距离。根据这个思路, 为了便捷地到达亚洲, 就应当开辟出一条从欧洲出发向西横渡大西洋的新航路。不过, 马泰卢斯等人都是学者, 他们只是坐在书斋里想象着如何横渡大西洋, 而第一个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的, 则是航海家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2 年—1506 年)。

二、美洲大陆与“天城”

哥伦布年轻时就开始了航海生涯,并在30岁左右产生了横渡大西洋前往亚洲的念头。⁽³¹⁾为了论证这个设想,他广泛阅读古代及当代的多种地理著作,因而熟悉托勒密的观点。⁽³²⁾虽然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人都认为地球可以分为360度,但对于一个经度的距离则有不同的说法。15世纪,随着大批古希腊经典从阿拉伯世界重新传回西欧,学者们还把阿拉伯人所使用的长单位阿拉伯里(一个阿拉伯里约等于1972米⁽³³⁾)与意大利人所使用的长度单位罗马里(一个罗马里约等于1481.5米⁽³⁴⁾)搞混在一起。例如,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学者阿尔法加尼(Al-Farghani,拉丁文作Alfraganus,约805—880年)曾提出,一个经度等于 $56^{2/3}$ 阿拉伯里。哥伦布在戴利(Pierre d'Ailly, 1350—1420年)所著的《世界影像》(Imago Mundi)中读到了阿尔法加尼的观点,但把阿拉伯里错误地等同于罗马里,并据此估计出地球赤道周长相当于30240公里,比实际周长减少了将近1/3。⁽³⁵⁾马泰卢斯等人认为从福岛向东到亚洲东端共有230度,哥伦布则进一步夸大这一数字,认为这个数字应当在280—300度之间。这就意味着,从欧洲向西由海上到达亚洲东部的距离不到100度了。⁽³⁶⁾他估计,最多28天就可以横渡大西洋抵达亚洲沿海。⁽³⁷⁾因此,当他经过30多天的航行于1492年10月12日到达巴哈马群岛时,就很自然地将其认定为亚洲沿海。

哥伦布1492年首航美洲之前,虽然没有直接阅读过《马可·波罗游记》,但由于这部游记“已经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广泛影响,并且主导了欧洲本土居民对于东方的看法”,⁽³⁸⁾所以,喜爱读书的哥伦布完全可能通过其他人的著作间接地了解到《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一些内容,包括“行在”等中国地名。1492年10月21日,哥伦布认为,印第安人通过手势告诉他的古巴(Colba),就是“日本国”(Cipango)。他在日记中还写道:“我自己决心要到大陆去,要去行在城(la ciudad de Quisay),把陛下的信件呈交给大汗(gran can),并带回他的回信。”⁽³⁹⁾11月1日,哥伦布认为,自己“距离刺桐(Zayto)和行在(Quisay)的距离大约只有100里格(leguas)。”⁽⁴⁰⁾这样,在哥伦布看来,古巴就是“蛮子”的一部分。这一年的10月30日和11月21日,哥伦布在古巴北部沿海航行时,都认为自己的位置是北纬42度左右。⁽⁴¹⁾这样,哥伦布也和马泰卢斯等人一样,认为行在位于北纬42度一带。

哥伦布始终认为,自己横渡大西洋所到达的地方,就是亚洲最东部的“蛮子”地区。⁽⁴²⁾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1506年康达里尼(Giovanni Matteo Contarini, 1452—1507年)世界地图,1506年罗赛里世界地图,1507年卢斯旭(Johann Ruysch, 约1460—1533年)地图等,都把古巴画在中国沿海,与行在(北纬45度左右)隔海相望。拉科萨(Juan de la Cosa, 约1450—1510年)在1500年绘制的世界地图上,甚至把古巴的一个海角称为“蛮子角”(C. Mangui)。⁽⁴³⁾

1500年前后,意大利人亚美利哥(Amerigo Vespucci, 约1454—1512年)通过在南美洲的几次实地考察,认为那里并不是亚洲的一部分,而是一块欧洲人前所未知的“新世界”(Mundus Novus)。⁽⁴⁴⁾德国学者瓦尔德西姆勒(Martin Waldseemüller, 约1470—1518年)在1507年绘制的世界地图上,首次用亚美利哥的名字来命名这块新大陆,称其为America,这也是中文“美洲”译名的来源。在瓦尔德西姆勒1507年绘制的地地图中,最有影响的是目前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中的大型挂图,共由12幅小图构成,总大小为132×236厘米。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公布的高清版本上可以看到,行在(Quinsaij)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北角,具体位置是,距离福岛230度左右,北纬40—50度。行在城被画成欧洲式的城堡,旁边还有两条注文。第一条是:“行在城:周长100哩,城内有1万2千座桥梁”。第二条注文是:“蛮子省的行在城,译成我们语言意为‘天城’,城中有一个大湖。”

这样,在16世纪前半期,欧洲人对于行在的位置,形成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哥伦布所到达的美洲是一块前所未有的新大陆,独立于亚洲,亚洲沿海的行在城与美洲隔着一片辽阔的海洋。反映这种观点的地图,主要有1514年奥雷留斯(Cornelius Aurelius, 1460—1531年)世界地图,1518年无名氏世界地图,1541年墨卡托(Gerard Mercator, 1512—1594年)世界地图,1550年萨拉马克(Antonio Salamanca, 约1500—1562年)世界地图,等等。⁽⁴⁵⁾第二种观点依然认为,美洲大陆与亚洲大陆是连成一片的,行在位于亚洲大陆的沿海。反映这种观点的地图,主要有1546年洪特鲁斯(Johannes Honterus, 1498—1549年)世界地图,1548年伽斯塔第(Giacomo Gastaldi, 约1500—1566年)世界地图,1548年威尼斯出版的托勒密《地理学》附图。⁽⁴⁶⁾虽然这两类地图对于美洲与亚洲大陆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不过,地图上行在的位置却基本相同,都在北纬40—50度之间。

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 1485—1547年)首次抵达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欧洲文献中

写作 Tenochtitlan 或 Temixtitlan 等), 还受到了阿兹特克皇帝蒙特苏马(Mutezuma, 约 1466—1520 年)的热情招待。1521 年 8 月, 科尔特斯攻陷并毁灭了特诺奇蒂特兰, 在其废墟上建立起了墨西哥城。科尔特斯等殖民者告诉欧洲人, 特诺奇蒂特兰建在特斯科科(Texcoco)湖中, 四周有桥梁与陆地相连, 城里有宏大的皇宫, 高耸的神庙, 繁荣的市场, 熙攘的人群。⁽⁴⁷⁾科尔特斯本人还绘制过表现这种场景的特诺奇蒂特兰城市图, 并于 1524 年在欧洲出版。⁽⁴⁸⁾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些人自然想到了马可·波罗早就介绍过的“天城”行在。意大利学者拉木学就这样写道: “科尔特斯在新西班牙发现了特诺奇蒂特兰, 此处有蒙特苏马皇帝雄伟的皇宫。这座伟大的城市, 难道不是和蛮子省(Provincia di Mangi)的行在城(Quinsai)同样宏伟吗?”⁽⁴⁹⁾

拉木学只是认为特诺奇蒂特兰与行在有相似之处, 都非常宏伟。而德国学者舍纳(Johann Schöner, 1477—1547 年)则直接认为, 特诺奇蒂特兰就是行在城。他在 1533 年出版的著作中写道: “从西班牙向西航行很长一段距离, 可以到达上印度(Superiori India), 那里有名为墨西哥和特诺奇蒂特兰的地方, 这个地方以前称为行在(Quinsay), 在他们的语言中, 意为‘天城’(ciuitatem coeli)”。⁽⁵⁰⁾这样, 在舍纳看来, 特诺奇蒂特兰就位于亚洲东部的上印度, 曾经被称做“行在”。不过, 纵观当时的欧洲文献, 舍纳的这一观点, 并没有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

哥伦布于 1492 年抵达美洲后, 由于欧洲人长期无法确定美洲与亚洲的关系, 因而也就无法确定行在城与美洲的关系。更有意思的是, 当欧洲人于 16 世纪前期抵达中国沿海后, 对于行在城的观念反而变得更加混乱了。

三、卫匡国的贡献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 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 希望找到一条越过大西洋到达亚洲的海上航路。与此同时, 葡萄牙人则致力于寻找绕过非洲南端通往亚洲的新航路。1497 年底, 达·伽马(Vasco da Gama, 1469—1524 年)船队绕过好望角, 进入印度洋。至少在 1513 年, 葡萄牙人已经出现在广东沿海。1524—1548 年, 葡萄牙人还在宁波双屿建立了欧洲人在东亚的第一个贸易据点。⁽⁵¹⁾1519—1521 年麦哲伦(Fernão de Magalhães, 1480—1521 年)环球航行之后, 西班牙人又不断经美洲进入太平洋地区, 并从 1565 年开始在菲律宾建立据点。⁽⁵²⁾这样,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通过海上航线从东西两个方向来到中国沿海。

欧洲人来到中国沿海后, 通过与中国人直接交往, 获知中国的正式名字是“大明”, 首都北京(被写作 Pequim 或 Paquem 等)又称为京师(Quincij), 位于顺天府(Xutianfu)。⁽⁵³⁾这样, 欧洲人就产生了一个困惑: 马可·波罗等人所介绍的“契丹”、“蛮子”、“行在”等地方, 与“大明”是什么关系呢 1600 年前后, 欧洲人对此进行了探讨, 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观点。⁽⁵⁴⁾对于“蛮子”, 有人认为就是中国(大明), 也有人认为是不同的国家。关于“行在”的位置, 主要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位于北纬 36 度以南地区。第二种说法认为就是“南直隶”(南京)。第三种认为就是北京, 位置是北纬 54 度。第四种说法认为就是京师, 又称顺天, 具体位置大约是北纬 46 度。⁽⁵⁵⁾此外, 还有人提出过, 可能是苏州或杭州。⁽⁵⁶⁾

欧洲人对于行在的混乱观念, 同样反映在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绘制的地图上。例如, 在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 年)1570 年出版的《亚洲新地图》(Asiae nova descriptio)上, 行在(Quinsai)被置于北纬 40—50 度之间, 位于京师(Quinci)的东北面。在普兰修(Petrus Plancius, 1552—1622 年)1594 年出版的《修订版世界全图》(Orbis terrarum typus de integro multis in locis emendatus)上, 行在(Quinzai)位于顺天(Xuntien)的东侧, 靠近朝鲜半岛。在阿诺尔迪(Arnoldo di Arnoldi)1600 年出版的《亚洲地图》(Asia)上, 行在(Quinzay)被画成是大湖中的一座城堡, 并有大段注文: “正如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所说的那样, 行在(Quinzay)城周长 100 哩, 有 12000 座桥梁”。在行在城的上方, 有北京(Pangin), 下方又有京师(Quinci)。斯皮德(John Speed, 约 1551—1629 年)在 1626 年出版的《中国地图》(The kingdom of China)上, 认为行在是山东(Xanton)省的一个城市, 位于京师(Quincii)的下方, 但同时认为行在(Quinzay)与顺天(Xuntien)是同一个城市, 地图上的注文明确写道: “顺天, 又称行在”。洪迪乌斯(Jodocus Hondius the younger, 1593—1629 年)在 1628 左右出版的地图上有这样的注文: “顺天, 别名行在, 这是天城, 中国皇帝的皇宫就位于此处。”不过, 这幅地图将北京(Paquin)错误地当成是另一座城市。⁽⁵⁷⁾

由于明朝实行海禁政策，欧洲人来到中国后，只能在沿海地区活动，无法进入内地。1583 年，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 年) 经过种种努力，终于获准在广东肇庆居住。虽然罗明坚获得了考察中国内地的机会，但他对行在的认识却是错误的。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收藏的一幅未刊地图 (编号 ARSI, C. F. Cass. 12, doc. 4) 上，罗明坚在其背面这样写道：“中国的首都名叫‘顺天’ (Suon Tian)，又名‘京师’ (Chin Ssi)，民间称其为行在 (Chinzai)，有时还被称为北京 (Pachin)。”⁽⁵⁸⁾ 这样，在罗明坚看来，行在、顺天、北京、京师就是中国首都的不同名字。

到过南京等地的意大利耶稣会士郭居静 (Lazzaro Cattaneo, 1560—1640 年) 则认为，行在是指南京。1599 年 7 月 28 日，⁽⁵⁹⁾ 意大利商人卡雷蒂 (Francesco Carletti, 1573—1636 年) 从长崎来到澳门，随后拜访了郭居静。卡雷蒂这样写道：“许多人认为，南京 (Nanchin) 城就是行在 (Quinzai)。熟知中国情况的郭居静神父向我确认了这一点。他在南京买过一间房子，用来为耶稣会服务。郭居静神父告诉我，他曾将南京城与一些著作所描述的行在进行了对比，发现两者在有许多吻合之处。郭居静神父举例说，南京有 4000 座极大的桥梁，大船可以非常便利地从桥下扬帆通过。他还告诉我，南京城很大，周长是 25 哩 (miglia)，坐落在中国西部，纬度是 32 度；城中有皇帝住过的皇宫，皇宫有三道城墙，每道城墙都有护城河，河水就来自横贯南京城的那条大江。三条城墙共长 5 哩。皇宫里面有森林，湖泊，花园，还有供皇帝享乐的其他东西。”⁽⁶⁰⁾ 文中说南京“坐落在中国西部”，无疑是错误的。根据卡雷蒂的记载，在郭居静看来，南京城的宏大规模，城中的众多桥梁，明朝的皇宫建筑，美丽的玄武湖等特征，正符合马可·波罗对于行在的描述，所以认为行在城就是南京。

1600 年前后，虽然有的欧洲人已经提出，马可·波罗笔下的行在就是杭州，但仅是一种猜测，并无论证。第一位将行在考定为杭州的，则是另一个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

卫匡国 1642 年到达澳门，1643 年来到杭州。此时，正值明清鼎革之际。在此动荡岁月中，卫匡国逃到福建，参加过隆武政权的抗清斗争，1646 年被清军带回杭州。1651 年初，卫匡国从福建上船，于 1653 年回到欧洲。1657 年，卫匡国再次离开欧洲，于 1658 年到达澳门，1659 年重回杭州，随后主持修建武林门的教堂。1661 年，卫匡国在杭州去世，并被埋在杭州。⁽⁶¹⁾

卫匡国首次来到中国后，刻意搜集各种资料，并且编写著作。他于 1653 年返回欧洲后，将自己用拉丁文编纂的《中国新地图集》 (Novus Atlas Sinensis) 交由荷兰出版商布劳 (Joan Blaeu, 1596—1673 年) 出版。1655 年，布劳出版了《中国新地图集》，并在欧洲不断再版，流传很广。由于卫匡国在杭州先后生活了 6 年多时间，所以，他在《中国新地图集》中对杭州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并且提出了一系列“不可辩驳的证据”，⁽⁶²⁾ 认为杭州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行在。

卫匡国首先探讨了“行在”一名的由来。他认为，“中国普通百姓把皇帝居住的城市称为‘京师’ (Kingsai)”，由于发音的讹变，这个称呼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变成了 Quinsai。卫匡国同时指出，“‘京师’一名是个尊称，其意思是‘宫廷所在的地方’，并非是某个城市的名字”，马可·波罗所说的‘京师’，其真实的名字是杭州 (Hangcheu)”。卫匡国解释说：“为了躲避金人 (Kin) 的侵扰，宋朝 (Sung) 高宗 (Caoçung) 皇帝逃到杭州并定都于此，所以，马可·波罗在中国时，杭州又被称为‘京师’。宋朝时，杭州还曾被称为‘临安’。”也就是说，卫匡国的观点是，马可·波罗对杭州的称呼 Quinsai，源自汉语“京师”一词。其次，杭州城里的众多桥梁，与马可·波罗的描述基本相符。卫匡国这样写道：“杭州城内外有数不清的高桥，但肯定没有马可·波罗所说的 1 万座那么多，估计他可能将那些模样酷似桥梁的牌楼也计算在内了”。第三，马可·波罗热情介绍过的那个湖，就是杭州西湖。马可·波罗说这是一个清澈的淡水湖，湖中有两座小岛，湖中游船往来，湖的四周布满了宫殿豪宅。卫匡国相信，马可·波罗的这些叙述，都与西湖的特征相符。第四，马可·波罗所说的城外大河，正是钱塘江 (Cientang)。卫匡国认为，钱塘江不仅位置与马可·波罗的描述相吻合，而且“它向东流入东海，与海洋的距离也与马可·波罗的计算相符。”根据这些证据，卫匡国得出如下结论：“无论从历史、名称、城市规模，还是从马可·波罗到访的日期和描述的细节上来判断，杭州就是 Quinsai (京师)。”⁽⁶³⁾

卫匡国作为一个长期在杭州生活过的人，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得出了马可·波罗所说的 Quinsai 就是杭州的结论。这个结论，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很快被其他欧洲学者所接受，并成为主流观点。意大利著名的巴洛克文学家、耶稣会官方

史官巴尔托利(Daniello Bartoli, 1608—1685 年)在 1663 年出版的《耶稣会史：中国卷》(Dell' 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 La Cina)中接受了卫匡国的观点，认为行在(Quinsai)就是杭州(Hanceu)。⁽⁶⁴⁾德国学者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1—1680 年)在 1667 年出版的《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中，大段抄录了卫匡国关于杭州的原文。⁽⁶⁵⁾葡萄牙入华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 1609—1677 年)在 1688 年出版的《中国新史》(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中说，卫匡国“很好地解释了”杭州为什么被称为“京师”。⁽⁶⁶⁾英国学者玉尔(Henry Yule, 1820—1889 年)在《马可·波罗之书》这一传世名作中，同样认为 Kinsay 或 Quinsai 之类的名称，就是“京师”的音译，指的是杭州。⁽⁶⁷⁾法国学者沙海昂(Antoine Joseph Henri Charignon, 1872—1930 年)在 1924—1928 年注释出版的《马可·波罗行纪》(Le livre de Marco Polo)中，采用了玉尔的观点。⁽⁶⁸⁾

20 世纪初，一些日本学者提出，马可·波罗等欧洲中世纪旅行家所说的 Quinsai，并不是汉语“京师”的音译，而是“行在”的音译。藤田丰八(1869—1929 年)这样写道：“玉尔氏称当时之杭州为京师，实臆断耳。当宋室南迁，绍兴八年奠都于杭州时，为使君臣不忘恢复中原起见，特称为‘行在’，不呼京师。此苟阅《宋史》或当时诸臣之奏议，当可瞭然。”⁽⁶⁹⁾桑原隲藏(1870—1931 年)则通过音韵学的考证，进一步指出，“南宋以至元初，中国南部行字之头音，kh 较 H 近也”，“‘在’字之音，无显著变化，大约古读如 sai 或 tsai 而已”。⁽⁷⁰⁾日本学者的这个考证，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所以，很快被中国学者所接受。向达在 1929 年发表的文章中说：日本学者“从文献上及字音上”的考证，“理由颇足，因从其说，译为行在”。⁽⁷¹⁾冯承钧 20 世纪 30 年代在将沙海昂的注释本译成中文时，也采用了日本学者的成果，全书都用“行在”一词。^⑧英国学者穆尔(Arthur Christopher Moule, 1873—1957 年)原先认为 Quinsai 是“杭州”的音译，但他在 1957 年出版的《行在杂考》(Quinsai with other Notes on Marco Polo)一书，放弃了原先的观点，并根据中外文史料进一步论证了 Quinsai 是“行在”的音译。他还写道：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 年)也多次说过：“从音韵学及历史学上来看，马可·波罗所说的 Quinsai，其来源只能是‘行在’，而不可能是‘杭州’。”⁽⁷²⁾这样，到了 20 世纪上半期，将 Quinsai 之类的词汇译成“行在”，成了学术界的共识。

中世纪旅行家马可·波罗向欧洲人介绍说，东方有个“天城”叫 Quinsai，它是世界上“最富丽名贵之城”，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无限向往。从 14 世纪后期开始至 17 世纪后半期，欧洲人一直在寻找 Quinsai 的位置。最后，长期在杭州生活过的卫匡国，首次明确地将 Quinsai 考定为杭州城，但他错误地认为此词是“京师”的音译。20 世纪前半期，经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最终得出了 Quinsai 源自“行在”的可靠结论。在 600 多年的历史中，欧洲学者对 Quinsai 的地理位置及其来源进行了长期的探讨。这样，杭州不仅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而且还是欧洲学术研究中一个持续讨论的主题。历史上，杭州曾经借助于学术研究这个桥梁而登上欧洲学术舞台，今天，日益繁荣的杭州，更将通过扩大包括学术在内的各种联系而扩大在全球的影响。

注释：

1 孔陈焱：《早期来华欧洲人对浙江的认知》，《浙江学刊》2002 年第 4 期。

2 龚缨晏：《欧洲与杭州：相识之路》，杭州出版社，2004 年，第 74—90 页。

3 黄时鉴：《马可波罗游记与西方古地图上的杭州》，李治安、宋涛主编：《马可波罗游历过的城市—Quinsay》，杭州出版社，2012 年，第 1—19 页。

4 周东华：《描述“人间天堂”：20 世纪前西方人对“杭州”的集体记忆》，《晋阳学刊》2018 年第 5 期。

5 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一，宋元方志丛刊，第四册，中华书局，1990 年，第 3241 页。

6 范成大：《吴郡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668 页。

-
- 7 A. C. Moule, P. Pelliot,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London: G. Routledge, 1938, p. xlv.
- 8 A. C. Moule, P. Pelliot,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p. 499.
- 9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沙海昂注,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4年,第570-589页。
- 10 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 49-50.
- 11 José Rabasa, Inventing America: Spanish Historiography and the Formation of Eurocentrism,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p. 61.
- 12 C. W. Dutschke, Francesco Pipino and the Manuscripts of Marco Polo's Travel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PHD Dissertation, 1993, pp. 263-275.
- 13 Leo Bagrow, "The Maps from the Home Archives of the Descendants of a Friend of Marco Polo", Imago Mundi, Vol. 5, 1948, pp. 3-13.
- 14 Rodolfo Gallo, "Le mappe geografiche del palazzo ducale di Venezia", Archivio Veneto, No. 5, 1943, pp. 47-89.
- 15 Evelyn Edson, The World Map, 1300-1492: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03.
- 16 K. Nebenzahl, Atlas of Columbus and the Great Discoveries, Chicago, New York, San Francisco: Rand McNally, 1990, pp. 6-8.
- 17 G. H. Kimble, The Catalan World Map of the R. Biblioteca Estense at Modena, London: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1934, p. 8.
- 18 John Kirtland Wright, The Leardo Map of the World, 1452 or 1453,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28, p. 38.
- 19 D. Woodwar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3, Part 1,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 316.
- 20 P. Falchetta, Fra Mauro's World Map, Turnhout: Brepols, 2006, pp. 61-67.
- 21 H. Yule, H. Cordier,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15, pp. 14-19.
- 22 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Vol. 1,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59, pp. 364-365.
- 23④ A. C. Moule, P. Pelliot,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pp. 339, 326.
- 24 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蔡宗夏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7页。

-
- 25 O. A. W. Dilke, *Greek and Roman Map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60–164.
- 26 T. Campbell, *The Earliest Printed Maps*,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72–74.
- 27 C. Van Duzer, “Graphic Record of a Lost Wall Map of the World (c. 1490) by Henricus Martellus”, *Peregrinations: Journal of Medieval Art and Architecture*, Vol. 5, Issue 2, 2015, pp. 48–64.
- 28 C. Van Duzer, *Henricus Martellus’ s World Map at Yale (c. 1491)*, Gewerbestrasse: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9, pp. 99–100.
- 29 G. B. Ramuscio, *Delle navigationi et Viaggi*, secondo volume, Venezia: Appresso i Giunti, 1593, p. 48r.
- 30 E. G. Ravestein, *Martin Behaim: his life and his globe*, London: George Philip and Son, 1908, p. 93.
- 31 D. West, “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His Enterprise to the Indies: Scholarship of the Last Quarter Century”,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49, No. 2, 1992, pp. 254–277.
- 32 V. I. J. Flint, *The Imaginative Landscap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2–45.
- 33 J. B. Harley, D. Woodward (e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2, Bk.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177.
- 34 S. A. Bedini, *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the Age of Exploration: an Encyclopedia*, London: Da Capo Press, 1998, pp. 125, 232, 671.
- 35 W. G. L. Randles, “The Evaluation of Columbus’ ‘India’ Project by Portuguese and Spanish Cosmographers in the Light of the Geographical Science of the Period”, *Imago Mundi*, No. 42, 1990, pp. 50–64.
- 36 S. A. Bedini, *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the Age of Exploration: an Encyclopedia*, p. 127.
- 37 V. F. Rickey, “How Columbus Encountered America”, *Mathematics Magazine*, No. 4, 1992, pp. 219–225.
- 38 John Cummins, *The Voyag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Columbus’ Own Journal of Discovery*,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1992, p. 10.
- 39 Cesare De Lollis (ed.), *Scritti di Cristoforo Colombo (Raccolta di documenti e studi pubblicati dalla R. Commissione colombiana pel quarto centenario della scoperta dell’ America, Pt. 1, Vol. 1)*, Roma: *Auspice Il Ministro della Repubblica Istruzione*, 1892, p. 28.
- 40 Cesare De Lollis (ed.), *Scritti di Cristoforo Colombo (Raccolta di documenti e studi pubblicati dalla R. Commissione colombiana pel quarto centenario della scoperta dell’ America, Pt. 1, Vol. 1)*, p. 34.

41 Cesare De Lollis (ed.), *Scritti di Cristoforo Colombo* (Raccolta di documenti e studi pubblicati dalla R. Commissione colombiana pel quarto centenario della scoperta dell' America, Pt. 1, Vol. 1), p. 33, 42.

42 塞·埃·莫里森：《哥伦布传》，下册，陈先太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41-143页。

43 D. José María de la Torre y de la Torre, *Apuntes Para la Historia de la Isla de Cuba: Mapa de la Isla de Cuba*, Habana: Imprenta del Gobierno y Capitanía General por S. M., 1841, p. 62.

44 L. Formisano, *Letters from a New World: Amerigo Vespucci's Discovery of America*, New York: Marsilio, 1992, pp. xix-xxv.

45 R. W. Shirley, *The Mapping of the World: Early Printed World Maps, 1472-1700*, London: the Holland Press, 1983, pp. 42, 50, 89, 105.

46 A. E. Nordenskiöld, *Facsimile-Atla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3, pp. 119, xlv.

47 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征服西班牙信史》，林光、江禾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96-197、210-219页。

48 K. Nebenzahl, *Atlas of Columbus and the Great Discoveries*, pp. 74-76.

49 G. B. Ramusio, *Navigazioni et Viaggi*, Secondo Volume, Venetia: Appresso i Giunti, 1583, p. 2.

50 Ioannis Schonerus, *Opusculum Geographicum*, Pars II, Caput I, Norimberga: 无出版社, 1533, 原书无页码。

51 Juan Gil, "Chinos in Sixteenth-Century Spain", in Christina H. Lee, ed., *Western Visions of the Far East in a Transpacific Age, 1522-1657*, Farnham and Burlington: Ashgate, 2012, pp. 139-151.

52 Mercedes Maroto Camino, *Exploring the Explorers: Spaniards in Oceania, 1519-1794*,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1-32.

53 João de Barros, *Terceira decada da Asia*, Em Lisboa: Por Ioam de Barreira, 1563, p. 45r.

54 邬银兰：《全球化的兴起与“行在”城的北移》，《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1年第1期。

55 无作者, *Thesoro Politico*, Pt. II, Milano: Appresso Girolamo Bordone e Pierto martire Locarni compagni, 1601, pp. 217-218.

56 S. Purchas, *Purchas His Pilgrimage*, London: William Stansby, 1626, pp. 441-442.

57 上述这些地图，均见澳门科技大学“全球地图中的澳门”（Global Mapping of Macao）数据库，网址：<http://gmom.must.edu.mo/>

58 ARSI, C. F. Cass. 12, doc. 4.

59 L. Magalotti (ed.), *Ragionamenti di Francesco Carletti fiorentino sopra le cose da lui vedute ne' suoi viaggi, si dell' Indie occidentali, e orientali come d' altri paesi*, Firenze: Stamperia di Giuseppe Manni, 1701, p. 197.

60 L. Magalotti (ed.), *Ragionamenti di Francesco Carletti fiorentino sopra le cose da lui vedute ne' suoi viaggi, si dell' Indie occidentali, e orientali come d' altri Paesi*, pp. 130-133.

61 白佐良:《卫匡国生平及著作》,张西平等主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0页。

62 Martino Martini, *Novus Atlas Sinensis*, Tomo Secondo, Trento: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Trento, 2002, p. 640.

63 Martino Martini, *Novus Atlas Sinensis*, pp. 640-643.

64 Daniello Bartoli, *Dell' 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La Cina, terza parte dell' Asia, descritta dal P. Daniello Bartoli della medesima Compagnia*, Roma: Stamperia del Varesse, 1663, p. 107, p. 559.

65 阿塔纳修斯·基歇尔:《中国图说》,张西平等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130—132页。

66 安文思:《中国新史》,何高济、李申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67 H. Yule,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Vol. 2, London: John Murray, 1926, p. 193.

68⑨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沙海昂注,冯承钧译,第575、575页。

69 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健民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2页。

70 桑原隲藏:《蒲寿庚考》,陈裕青译订,中华书局,2009年,第21—22页。

71 向达:《元代马哥孛罗诸外国人所见之杭州》,《东方杂志》1929年第26卷第10号,第91-104页。

72 A. C. Moule, *Quinsai with other Notes on Marco Pol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9.